“塔吊，现在几级风，请回答！”“九级，九级……”

北京朝阳区CBD，光华路南侧，高度442米，我蜷缩在写着“中国建筑”的厚棉衣里，瑟瑟发抖，听着对讲机里的消息。早上出门前，看到天气预报是蓝色大风预警，已知今日是场苦战。

登顶这个叫“中国尊”的项目想法由来已久，在北京城区几乎每个角落，人们都难以忽视它。虽然还有几十米封顶，但早就比不远处的国贸三期高出不少，已是名副其实的北京第一高楼。

既然想登顶，不如索性参与一下建设。2月7日，也就是正月十一那天，我到工地上向施工方—中建三局报了个名。当晚就接到通知，参加第二天一早的“顶升”。问了一下，意思是一天之内让楼升高4.5米。

记者体验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左图为中国尊上的工人在高空442米作业。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我在高空盖大楼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过完年开个好头

在保安室穿好工作服，我戴上白色的安全帽，披上一件有“中国尊大厦”字样的荧光绿背心。说来惭愧，在工地上，这都是管理人员的标识。

我稍作停顿，发现工人进入通道时，前面挂着的液晶屏都会显示其个人信息。走在前面的中国尊项目党委副书记刘晓霖一进去，就出现了“三局项目总包”字样。所有经过三级教育并考核合格的工人，安全帽里都放置了芯片。这里有严格的门禁系统。

在楼下仰望，“中国尊”已大半成型。这个从中国传统礼器“樽”的形状中汲取灵感的建筑，有着优雅的弧形轮廓，上下宽度渐变。最终，它将停留在528米的高度，地上108层，地下7层。从2013年7月29日开工至今，在建筑领域，中国尊已实现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最，传统文化意味之余，有着很高的科技含量。

乘坐两次电梯才到了楼顶。第一次升至42层，与一般高层建筑的电梯无异，轻盈、快速，其实就是大厦启用后的正式电梯。第二次要艰苦得多，所有人进入轿厢后，电梯师傅用粗绳一拉，电梯门上下合拢，带着巨大的噪声，用了足足4分钟才到楼顶。抬脚出去，一阵大风袭来，两腿冰冷。

山西人贺晓飞已在中控室指挥多时。这个位于顶升平台上的中控室，只有六七平米大小，已经站了五六个人。作为中国尊项目工程协调部副经理，在过去的92次顶升中，他指挥了差不多一半，经验非常丰富。

所谓顶升，是指智能顶升钢平台，这个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拥有14项发明专利的平台，长43米、宽43米、最大高度38米，有7层楼高，平台顶推力达4800吨。人们在北京城区抬头即可望到的中国尊顶部，其实就是顶升平台。

简单来说，顶升平台的用处是，每隔四五天，让这座大楼升高四五米。这技术在平常建筑中极为罕见，一般只用于超高层建筑。所有顶升过程，都要在数小时内完成。为此，需要上百人通力合作，更需要这个价值不菲的平台运行流畅。正月十二这天，是开年以来第一次顶升，需要开个好头。

这水才是“常温”的

贺晓飞的对讲机一刻不停。面对随时出现的问题，他总能在两三秒内做出指示。几句话说不清楚的，他干脆就跑出去看。

“贺经理，我在（微信）群里发的照片你看到没有？”对讲机里问。

“手机没信号，没信号。”

“背板有个螺帽没法拧紧，不影响这次顶升，但会影响下次。”对讲机里继续说。

“马上找人去焊一下！”

贺晓飞告诉我，眼下他在安排的是两件事，塔吊配平和销项。所谓塔吊配平，就是要使放置在平台上的两台M900D重型动臂式塔吊自平衡，确保使用期间的保护装置离开墙体。所谓销项，则是将智能顶升平台与墙体的连接暂时脱离。这两件事做完后，顶升才会缓慢的开始，上升速度大约1mm/s，这个速度确保了，即便上升过程中有故障，也能随时停下检查。

进展比预计的慢。年后刚开工，加上不少工人新来，都让前期准备有些生疏。不期而至的大风，虽让人不受雾霾困扰，却平添了几分施工难度。对讲机里，不断传来风力报告，始终稳定在八级、九级，甚至一度接近十级。

我想起曾背过关于大风的顺口溜，“八级风吹树枝断，九级屋顶飞瓦片，十级拔树又倒屋”。印象中，似乎第一次亲见此等大风，决定出去看看。塔机一体化组的王浩带我出门，指挥工人们将塔吊顶部用千斤顶支撑在平台上。他解释说，塔吊平时有底下的墙体支撑，顶升过程中如果风力过大，则需要停止顶升，利用平台支撑，风这么大，固定不好会摇晃。

说话间，不过四五分钟，开始冷得发抖。我站在442米高的楼顶上俯瞰北京，视野极佳，远处的故宫、奥体公园都清晰可见。大风中，我拿手机录视频发给朋友，对方回了句：“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回到中控室时，每个人都冻僵了。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嚷嚷着找水喝，拎出几瓶矿泉水刚要打开，忽然相视大笑。原来瓶子里装的水早已成冰，打开后几乎倒不出来。

“这水才是‘常温’的，别矫情，赶紧喝。”老一点的员工开起了玩笑。大家开始各显神通，化冰为水。

“任督二脉”打开了

孙晓亮很少加入开玩笑的行列，在气氛始终活跃的中控室，他显得沉默寡言。他表情平静，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操作平台的屏幕，手轻轻放在几个按钮上。

花了点时间，我向他讨教清楚了屏幕上那些参数的意思。数字一直在跳动，但始终不能让他满意。“11号油缸迟迟不行，冲不开”，他向我解释。屏幕上的数字里，的确只有11号的与其他相差很大。

整个屋里，只有孙晓亮全程参与了92次顶升。这位顶升操作员，过去只是一名电工，凭着刻苦钻研劲儿和在集团总部接受的数月培训，如今他对这些已是驾轻就熟。

逼仄的屋子里挤了近20人，不少小组的任务已经完成，等待着11号油缸的问题解决。工人们正全力抢修。好在，这个价值几千万的顶升平台，提供了超高层建筑罕见的工作环境——四周封闭，人感觉不到是在高空作业，跟在平地上没什么区别。

11时53分，对讲机里传来贺晓飞如释重负的声音：“‘任督二脉’打开了。”

疲惫的人群也松了口气。此时已是正午，盒饭如约而至。贺晓飞决定，吃完饭后正式顶升。午餐的菜是鱼、豆芽和卤蛋，130份盒饭，被冻了一上午的90多个人一扫而空。屋子里，似乎重新暖和起来。

在坚守中起高楼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我们马上开始顶升，请大家注意观察。”12时27分，贺晓飞在对讲机里发出指令时，大家各自回到岗位，屋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整整20分钟后，孙晓亮按下按钮，机器开始轰鸣。12时51分，平台升高了5厘米。外面依然是大风。他按下了暂停，对讲机那头，有人报告说一根钢筋头别在了平台与墙体间。稍作讨论，大家决定割断钢筋。

我出去察看，发现两名工人正往下递气焊设备，底下负责切割的工人接着。工地上处处都是安全标语，气焊所连接的氧气瓶附近，写的是“天天宣传天天安，日日防火日日守”，针对性很强。

钢筋头很快被切断，机器继续轰鸣。到下午两点，顶升完成1米，我所站的位置此时已是443米高。1mm/s的速度看起来慢，但理论上每小时也能升高3.6米，所以真正花时间的不是顶升本身，而是准备工作和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

刘晓霖专门向我介绍过，平台安装之初，顶升一次要用十几个小时。同时，各个工序之间磨合不够，需要七八天才能施工一个结构层。如今，三到四天就能完成一层，每次顶升时间只需三四个小时。

如今看来所言不虚。我趴在操作台上，跟孙晓亮一起默默盯着屏幕，即便对我这个外行来说，那些数字也有了非常明确的意义。1.5米，2米，2.5米，3米……每个节点上，大家都互相通报一声。

我们边看边聊。孙晓亮盘算着，总共需要107次顶升，才会建起这栋108层的高楼。剩下的只有十几次了，站好这最后几班岗，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

按计划，中国尊将于今年结构封顶，2018年底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如果一切顺利，大厦施工工期将为62个月，较同类超高层建筑缩短约18个月，速度则将是国内已建成同类项目开发建设速度的1.4倍。

尽管如此，对建设者来说，超高层建筑也是耗时长久的工作。贺晓飞指着马路对面的央视大楼对我说，他花了8年参与建设那个楼，在如今这个工地则已待了快4年。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匆匆而过，个中辛苦自不必说。好在，中建强制要求他们每周至少休一天，确保大家得到必要的休息。

下午4时04分，贺晓飞在对讲机里宣布，顶升4.9米任务完成。但此时还没到如释重负之时，计划升高4.5米，多出来的40厘米，是为了落下支撑架。14分钟后，顶升平台开始回落，4时25分，支撑架落到位。此时，距离我上来，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

一天大风，刮的晴空万里，夕阳投射过来几束清冷的光。电梯如约而至，工人们开始分拨陆续下去。中建的管理人员还不能下去，准备多充分，后期清理也要多认真。他们得坚守到所有人都离去。

此时，人们在北京抬头望，会看到一栋高446.5米的建筑。

图为建设中的“中国尊”大楼。
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

在张北县谈过年小吃

习近平：这个是你们买的吧。

村民：自己炸的。

习近平：这个是自己炸的吗？我刚才刚说完，我比较爱吃江米条。尝尝。

村民：江米条，小的时候过年吃。

习近平：我现在每年过年了，在街上买点江米条，还有一个叫炸排叉，你们叫什么，就是那个炸的叶子。

村民：炸麻叶。

习近平：然后现在我们也不自己做了，就到街上买两斤回来，但是油大，平常也不让多吃，反正过节的时候吃一点。

——摘自习近平在河北省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视察时与村民的对话（1月24日）

背景资料

炸排叉：传统面食，老北京特色美食。简单易做的节年小食，除了初嚼时的脆感之外，留下的还有满口的酥香。很适合下酒之用。

江米条：汉族小吃，属于春节过年必备食品。用糯米面加豆粉和面后在焖锅里蒸出来，放在石臼里用棒子捶，再擀成圆形，晒干用油煎出来，最后蘸梅花、松花、芝麻等豆沙制作而成的一种食品。

聚焦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长城最了解我的心事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在金山岭长城上，采访农民摄影师周万萍仍纯属偶然。

让记者极为震撼的是：他在自己拍摄长城30多年的时光中，拿下了50余项国内外摄影大奖！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把中国摄影金像奖、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奖、“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比赛二等奖等统统收入囊中。

美国著名摄影大师路易斯·卡斯特涅达，看了周万萍的作品后，自叹不如：“拍长城，我拍不过他。”

“没有亲身体验，怎会对长城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二道梁村，有个小院就是周万萍的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周万萍从小就在长城脚下听长辈们讲着长城的各种故事，在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奇迹”就已深深地种在他心里。

初中时美术老师带去的一台海鸥相机点燃了周万萍的摄影兴趣。为了攒钱买一台旧相机，因幼时意外导致右手和左腿终生残疾的他开始了为修长城背砖挣钱的艰苦经历。

就在为长城背砖的4年里，周万萍发现游客常有拍照留念的需求，这激发了他对摄影的热情。攒了一年半的零用钱，1985年，周万萍去镇里的照相馆花40元买了一台二手海鸥相机。“那时候40元是什么概念？”他说，“一根冰棍才一分钱。”

之后一年，他开始在长城上给游客拍照赚钱，还之前照相馆老板赊给他的胶卷钱，在他22岁时，他转到了风光摄影上，开始了他专注的“长城摄影”之路。

长年累月的守望、攀登、拍摄，使周万萍对金山岭长城的种种都可谓了如指掌，最为神奇的可以说是他对气候的“预判”了。

滦平县常年干旱，雨水很难得，所以只要一下雨，周万萍一定会放下手上的一切活儿，背起设备就登长城，不顾雷电、暴雨的危险，耐心的等待时机，专注的寻找角度，终于在某次太阳快落山时，突然晴天，东边出现了一道壮丽的彩虹，作品《气贯长城》就此诞生了，并获得了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奖。

在众多作品中，周万萍最引以为豪的是参选1998年联合国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比赛的照片，在来自93个国家4万多幅作品中获得二等奖，不过他更愿意将之归功于长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下雨时，长城上每一块砖都泛着油光；阴天时，长城与天距离更近，乌云触手可及；沙尘暴来袭时，漫天黄沙、天地一色，长城更显分量；雪天时，白色遮住杂乱，长城的曲线就凸显出来了……他细数道。

年过半百的他总是天不亮就登上长城，随身背着相机，时刻准备捕捉长城微妙的“表情”。谈到摄影的秘诀，他说：“拍好任何东西首先要热爱它。”

除了买东西、问路的游人，周万萍还接待着不少慕名而来的摄影者，或请他当向导，或请教经验。每当这时，周万萍总是把自己知道的拿出来与人分享，毫无保留。

的确，对于长城，周万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家就在金山岭脚下的二道梁子，与长城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透过窗子就能望见那条巨龙在群山间舞动。拍长城，条件得天独厚，但30多年的不离不弃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从海鸥120，到虎丘135，再到后来的尼康、佳能、美能达，周万萍手中的相机越来越好了，长城的细微变化在镜头里也愈发细腻生动起来。

许多次，当疲惫与孤独来袭，他也曾犹豫要不要卖掉相机，停止拍摄，但当他望着古老的城砖，追逐着光线一遍遍抚摸它们的时候，又总是难以割舍。“长城最了解我的心事。”周万萍说。

众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尹晓宇